

因应西进与牺牲限度： 浙赣战役之“衢州决战”决策新探

周东华

【摘要】 1942年5月爆发的浙赣战役一直被学术界视为中国为盟国承受日军报复所作的牺牲，研究视角相对单一，中国应战相对被动。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角看，浙赣战役是一场以中英美苏为代表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与以德意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在“欧洲战场”和“东方战场”的正面较量。中国政府在“东方战场”场域中，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即确立“中英美苏”共同抗击日军的“抗战政略”。据此，1942年初因应日军“西进”的浙赣战役备战决策是对日军“西进”攻击的主动因应；美军轰炸东京后“衢州决战”决策，是对为抗战道义和为同盟道义而“牺牲”之“以义应之”；而放弃“衢州决战”决策，则是“弱国”保存军力与实力之“以力应之”。

【关键词】 东方战场；浙赣战役；衢州决战；决策；中国立场

【中图分类号】 K26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25)04-0001-11

【作者简介】 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311121

1942年5—7月的浙赣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正面战场的22次会战之一。已有研究涉及浙赣战役的起因、经过，蒋介石放弃衢州决战的原因，中美分歧与浙赣战役结局等问题，结论主要有浙赣战役起因因为中国为美国轰炸东京承受日军报复，蒋介石对“衢州决战”决策朝令夕改导致浙赣战役失败等；也有研究认为蒋介石取消衢州决战保存了实力；还有学者从中美关系史角度重新讨论了浙赣战役。^①既有研究已较为充分，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首先，浙赣战役固然是中国为美军轰炸东京遭受日军报复所作出的牺牲，但蒋介石为何愿意承担“牺牲”？他愿意承担何种程度的“牺牲”？其次，这种“牺牲”是否意味着蒋介石是被动“应战”？最后，浙赣战役过程中蒋介石从与日军“衢州决战”到放弃决战的决策，是否真是出于为中国抗战保留实力的考量？要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探究蒋介石的抉择逻辑，在他因应日军“南进、北进和西进”攻击之“抗战政略”这一视域中重新探究其浙赣战役决策问题，进而重新认识抗战战略执行者和战役决策者的“主动性”与抗战前途问题。本文拟利用台北“国史馆”、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有关浙赣战役“衢州决战”往来

①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十八年の支那派遣軍」、朝雲新聞社、1972年，97—298頁；“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浙赣会战》，1980年；周江陵：《抗战时期浙赣战役述评》，《南开史学》1987年第1期；楼子芳、袁成毅：《浙赣战役：中国为盟军承受的一次巨大报复》，《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文正再：《论浙赣会战及其影响——兼论中国战场战略反攻机遇的丧失》，《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刘善庆：《抗战中期一次典型的消极避战之役——浙赣会战述评》，《安徽史学》2001年第4期；吴锡标、张仙君：《浙赣战役中的衢州会战》，《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10期；张力：《从决战到弃守：浙赣会战衢州战役蒋介石的抉择》，陈红民主编《中外学者论蒋介石：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122页；付辛酉：《中美战时军事合作的个案分析——以浙赣战役期间蒋介石军事决策为中心》，《民国档案》2015年第3期；荣维木等著《中国抗日战争史》第2卷《战时军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08—416页；张世英：《隐蔽出击抑或消极避战——国军第三战区面对浙赣会战的部署与肆应》，《“国史馆”馆刊》（台北）第67期，2021年3月；万旺：《1942年浙赣战役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杭州师范大学，2020年等。赖继年对浙赣会战有系列研究，见赖继年：《浙赣会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浙赣会战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论“浙赣会战”的胜败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关于“避免衢州决战”问题的史实考论》，《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电文、战报以及蒋介石、徐永昌、顾祝同等人日记,对“衢州决战”决策之“牺牲”问题,作一专题研讨。

一 因应日军西进之“衢州决战”战备决策

已有研究认为浙赣战役是日军为报复美军轰炸东京而对降落美军飞机之浙江衢州、江西玉山等地主动发动的侵略战争,目标是“击溃浙江方面的中国军队,摧毁可被利用来打击日本本土的航空基地”。^①从这个角度看,浙赣战役系日军挑起的报复战,中国方面似为“被动”应战。这是否符合浙赣战役实际进程呢?蒋介石对美军空袭东京是否知情?蒋介石“衢州决战”备战是否始于美军空袭东京之后?仔细阅读蒋介石相关材料,可以发现浙赣战役并非“被动”应战,而是一场从1942年初就开始主动备战、因应日军“西进”攻击的“衢州决战”;待到美军轰炸东京后,“衢州决战”才兼具为盟国承受“牺牲”和因应日军“西进”进攻之“自我”牺牲相结合的战役。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3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渤海湾为亚洲唯一军港,当为中美海军合作之基地,故旅顺必使倭寇交还中国,方能消除东亚之祸根……东北问题须作中国之一部分,而中日战争之解决,须作世界战争解决之一部分,故东北问题不必与倭急求谈判,以免美国为难也。”^②按照蒋介石设想,中国抗战前途非仅涉中日关系,而是关涉中日美苏之世界问题,在中国全民族抗战已经4年有余的背景下,“东北问题”成为撬动中日美苏的关键点。1941年12月8日凌晨4点,蒋介石接董显光电话,得知珍珠港事变发生,他的反应是:“半年以来,朝夕所期倭之南进北进者,今已达成大半,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日美国限制倭不许其南进北进,而独不反对其西进,然其全力侵华之危机,今已不复存在矣。”^③这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认为抗战终成“世界战争”,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之一,美国应优先投入巨大力量消灭日军,苏军亦应在远东对日开战,牵制、消灭东北日军南下,如此,中国当可由西向东,逐一收复失地,实现抗战胜利。

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罗斯福的第一反应是报复。据杜立特(James H. Doolittle)回忆,罗斯福在珍珠港事变后不久就命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1942年初,罗斯福不断催促美军空军尽快执行此报复计划。^④由于美方对此严格保密,蒋介石直到1942年4月初才隐约猜出美军对日有一秘密作战计划。1942年4月2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近日频繁对衢州等地轰炸之日军飞机“似由沪或杭起飞,且敌企图似在破坏我方机场设备”。^⑤此时,蒋介石尚未收到美方要求利用衢州机场等请求,因此对日军行动目的比较疑惑。

4月11日,蒋介石的疑惑得到初步解决,他说:“下午……会客,切嘱美空军改期至下月底,对倭国行动不宜过早,致碍余整个计划也。”^⑥从这条4月12日补记日记看,首先,蒋介石在4月11日下午“会客”时知道美国空军将会对日本有一行动,但该行动的具体时间和内容,蒋介石并不明了;其次,蒋介石特别希望美空军将行动“时间”改期,以配合他的“整个计划”。这就引出三个问题:第一,蒋介石会的客是谁?第二,美空军“行动”究竟为何?第三,蒋介石的“整个计划”是什么?4月14日,蒋介石日记称:“美空军毕雪尔代表要求最近期内利用衢州机场轰炸倭国。余以陆军准备未

① 「せ号(浙赣)作戰經過概要」,昭和17年5.1—9.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3071107800。

②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5日。据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2015年打字稿版,以下不再注明。

③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④ James H. Doolittle, *I Could Never Be So Lucky Again: An Autobiography by General James H. "Jimmy" Doolittle with Carroll V. Gline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1, pp. 229—232.

⑤ 《顾祝同电蒋中正敌机飞袭丽水衢州嵊县等处轰炸研判似由上海或杭州起飞企图破坏我方机场设备等情》,1942年4月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200-00074-254,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引用该档案不再注明藏所。

⑥ 《蒋介石日记》,1942年4月12日,补记11日部分。

完，仍照预定日期，至五月底实施；彼则急求实施，恐难展缓。此实与我整个战略相妨也。”^①由此可知，蒋介石此前会见的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驻华代表毕塞尔（Clayton Bissell，亦译为“俾索威”“毕雪尔”“毕赛尔”），所谓“行动”指利用衢州机场轰炸日本。而“整个战略”指中国政府对日本“南进、北进和西进”的预判及因应。

需要指出的是，毕塞尔告知蒋介石将利用衢州机场轰炸日本，但没有告知轰炸行动是美军飞机从衢州机场起飞还是空袭日本本土后在衢州机场等降落，故蒋介石以“陆军准备未完”为由，希望美方按照“预定日期”再行动。4月15日上午，毕塞尔再次请求蒋介石允借衢州机场以完成“行动”。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称：“美空军代表又来缠扰，二十日轰炸倭国计划不能改变，彼亦不肯明告实施行动，故余坚决反对，不允借用我机场。继复研究其语意，是其用航空母舰，直炸倭国后，再来中国着落加油也。如此与我战略不致大碍，乃即允之。”^②对于毕塞尔的再三请求，蒋介石本以美方不肯明告轰炸行动计划而再次拒绝。但在知晓美国空军将于4月20日从其航空母舰起飞轰炸日本之后再飞至衢州机场降落加油的行动计划后，蒋介石认为此与他的“整个计划”或“战略”没有冲突，才允借衢州机场。

在这两天日记中，蒋介石反复强调衢州机场是否借给美军使用的前提是“陆军准备完备”和“与我战略不致大碍”。蒋介石所谓“战略”当然指他的“抗战政略”，那么“陆军准备完备”又指的是什么？“陆军准备”与“战略”之间有何关系？

衢州机场位于衢县（今衢州市）东南，始建于1933年。1938年增铺滑行跑道，各长200米，宽200米，是当时中国空军第13总站。据顾祝同回忆：“抗战开始，衢县机场一直成为日机的空袭目标，至战事重心西移以后，衢县机场久无空军驻防……我于奉到中央修复衢县机场命令后，即飭当地地方政府，尽力协助，自三十年冬至三十一年春，不断予以扩建。空军方面也先后运到一部飞机用油及炸弹。”^③而在珍珠港事变前夕，蒋介石猜测：“两周以来，倭空军在南北各机场分别投弹，是其益恐美国空军来华向倭轰炸之所为乎？”^④此当指美国空军能够利用衢州机场起降以轰炸日本本土这一可能性。为此国民政府命令第三战区加大扩建衢州机场。

日军大本营在珍珠港事变后第三天（1941年12月10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第三百二十六号总作战命令”，计划“在确保帝国的自存自卫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基础上，在攻略南方要地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为此中国派遣军应“继续执行压制敌军的方针，尤其要强化封锁，以期破坏和瓦解敌军继续作战的企图”，其中第十三军负责黄河泛水流域、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及宁波附近的安全，尤其首先要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治安，“同时应与海军协同，确保从湖口附近到长江下游一段的交通”。此外，华北方面军及第十一、第十三、第二十三军可依其他命令，于上述所提及各要地穿插“进行地上作战”。^⑤由此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方为确保“南进”，加速“西进”，妄图快速解决中国抵抗。

日方的战略意图和作战动向，为中国政府所察觉。1942年1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注意”中写下“战略应重加考虑与修正”，涉及“甲、敌攻缅甸；乙、敌攻海参崴；丙、敌攻衢州”^⑥等事宜，表明到1942年1月中旬，蒋介石的“抗战政略”所对应的战略点“缅甸、海参崴和衢州”已经十分明确，其中“衢州”即因应日军“西进”。由此判断出发，蒋介石于第二天手谕徐永昌：“对于衢州、西安、潼关、咸阳、洛阳、襄樊、韶关、衡阳、福州，以及恩施十处之城防核心工事，应由军令部负责督促，限三

① 《蒋介石日记》，1942年4月14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42年4月15日。

③ 顾祝同：《墨三九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版，第211页。

④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6日上星期反省录。

⑤ 「支那派遣軍命令」，昭和16年12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3790300。

⑥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16日。

月底以前一律完成。”^①这份电令回答了“陆军准备完备”问题。蒋介石预判日军“西进”将沿铁路线开展,故选择浙赣路节点之衢州等10处设防,以抗击日军。

1942年2月3日,蒋介石电令顾祝同“负责整训,预防敌军攻衢”：“战区长官职务拟不更调,望积极负责整训,并于下月十五日以前预防敌军以四个师以上之兵力进攻衢州,希切实部署督训,及构筑工事,如期完成为要。”^②在这份电报中,蒋介石预判3月15日前日军将以4个师以上兵力进攻衢州,命令第三战区顾祝同切实部署督训,完成战备。顾祝同收到电报后,于2月6日与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赴衢州检视工事”,召集第86军团长以上军官、衢县专员及与工事有关各县县长等,进行备战指示和部署,并拨付50万元“以应急需而利工作”。^③由此亦知,蒋介石在美军空袭东京前已在衢州部署战备,其“衢州决战”计划,是基于其“抗战政略”中因应日军“西进”攻击之主动战备,并非是对日军发动浙赣作战攻击之被动因应。

二 “衢州决战”决策之“牺牲”内涵

1942年4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称:“本日为建都南京第十五周年纪念,而敌国东京适遭第一次之轰炸,其巧合天意乎。”^④对于美军轰炸东京,蒋介石既意外又兴奋,觉得一切都是上天注定,东京轰炸造成日本“全国惊惶失措”是对因日军侵略而沦陷的南京最好的“定都”纪念。徐永昌当日也记“今日美空军首次轰炸日本(东京、神户)”。^⑤在第二天日记中,蒋介石又说:“倭广播称,美机轰炸为最不人道与不守国际公法。不知其轰炸我国平民二年之久,其将何以自解也,可笑之至。”^⑥此时蒋介石尚未想到日军即将因此报复中国。此外,蒋介石对美军轰炸东京之飞机表示担忧:“此为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受轰炸,未知是否即与我约定来衢着落之飞机,果尔,则其时间相差一日,必致误事。美军做事,何如此之不慎耶?”^⑦4月19日,“军事会报,本日有美机三架,发现于浙、赣各地,此必昨日轰炸倭国之飞机也”。^⑧顾祝同也回忆称:

原来美国军方的计划,是让这艘航空母舰,航行到接近日本本土东海岸八百里的太平洋中,再令这些飞机由舰上起飞,轰炸日本后,直飞我国浙江省衢县的机场降落,在衢县补给油弹后,再由衢县机场起飞,轰炸日本,然后飞回航空母舰;这样穿梭轰炸,不仅会给日本本土严重的损害,而且将会打破日本军阀对国际狂妄的宣传。可是美国军方这一个计划,十分机密,并没有通知我国。只要求我们修复衢县机场备用;我接到中央的命令,也并没有想到这回事,总以为在我们与同盟国并肩作战,本战区的战略地位,自然更趋重要,衢县机场的修复备用,也是当然的事。^⑨

由于美军对轰炸东京严格保密,并且美军行动提早了一天,衢州方面并未做好接机准备,结果正如蒋介石所担心的那样“误事”:轰炸东京后飞往衢州机场降落的美机,因中国方面未在衢州机场安装信标,且差点被当作日机而引发空袭警报,所有灯都熄灭了,导致美军飞行员无法在机场着陆。^⑩结果,轰炸东京的16架美军飞机,除1架在海参崴降落外,其余15架在衢州、赣州、长沙、象

① 《蒋中正电徐永昌》,1942年1月1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70200-00013-025。

② 《蒋中正电顾祝同》,1942年2月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60100-00161-003。另见《蒋中正电顾祝同预期敌四师以上兵力进攻衢州希积极部署如限完成督训及构筑工事》,1942年2月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6-00016-051。

③ 《顾祝同电蒋中正遵于衢州进行部署情形》,1942年2月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6-00016-053。

④ 《蒋介石日记》,1942年4月18日。

⑤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4月1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73页。

⑥ 《蒋介石日记》,1942年4月19日。

⑦ 《蒋中正手书致林蔚史迪威罗卓英指示等》,1942年4月1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60100-00163-018。

⑧ 《蒋介石日记》,1942年4月19日。

⑨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第210页。

⑩ 萧邦齐:《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易丙兰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山、南昌、临安等地成功迫降。不幸的是，迫降在浙江象山和江西南昌附近的2架美机及8名美军飞行员被日军俘虏。^①

杜立特空袭令日本举国“上下震惊，国民初次感到似已卷入大东亚战争之漩涡”，日本民众甚至开始“对军部普遍抱有不信任感”。^②因此日本大本营决定采取行动，报复允许美军飞机降落的中国，破坏浙赣地区机场。4月18日，大本营开始更改原定4月20日发动的以治安作战为目的的“十九号作战”。^③4月22日，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杉山元下令原执行“十九号作战”的日本第十三军等转而执行浙江作战计划，要求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第十五、二十二、七十、一一六师团、河野混成旅团和军预备队保持原有态势，第十三军通信队和军兵站部主力立即返回上海，做好转入浙江作战的准备。^④此一作战计划，即被称为“せ号”（浙赣）作战，计划于5月15日发动。中国情报也证实，浙赣战役爆发前，日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二、七十师团分别在余姚、奉化一带集结；华北方面军之一部通过铁路运输至杭州西南一带；第十五、一一六师团各一部，以及独立第十七旅团集结到萧山、临浦、富阳、余杭等地区；日军海军陆战队从厦门北调。^⑤

4月27日，日本第十三军司令部致电参谋本部第二科，称有关发动作战的“大陆命”在3日后下达。^⑥4月30日，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621号和“大陆指”第1139号，计划以地面部队攻占浙赣主要航空根据地，至条件许可时，彻底破坏一切军事设施。^⑦中国派遣军据此确定浙赣作战方针：第十三军主力于5月15日自杭州方面开始攻击第三战区东部，摧毁在浙江省航空根据地；第十一军一部攻击第三战区西部，策应第十三军；同时命第一飞行团迅速攻击各地航空根据地。^⑧由此可见，日军发动浙赣作战，不仅仅是报复，更是其“西进”攻击的一部分。一旦浙赣作战获胜，日军可顺势再攻击长沙，进而一路“西进”。

在日军准备发动浙赣作战期间，4月22—23日，蒋介石连续收到日军轰炸义乌、丽水、玉山以及衢州机场的报告。^⑨蒋介石预判日军即将对浙赣发动战争，加速“衢州决战”战备。顾祝同称：“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与衢县机场的修复，战区已深感战略地位的重要，而加强战备。”^⑩4月24日，蒋介石电顾祝同“衢州金华一带工事程度及兵力部署速详报”。^⑪顾祝同于4月25日回电详细汇报了“衢州决战”的兵力部署和备战工事建筑情况，提出第86军欠第79师守备衢州、第63师守备兰溪；暂9军（欠暂33师守备温州）守备新昌嵊县；第88军（欠暂32师暂归9军指挥）守备陈蔡市（诸暨东南约20公里）安华、诸暨一带；第49军守备义乌、孝顺和东阳部分地区；第26军到达后，预定分驻龙游、汤溪、武义整训；第74军到达后，预定分驻金溪、弋阳、玉山整训，以上“5个军预定为金兰决战之主力”。备战工事方面，衢州工事“除水泥工事因水泥随运随筑外，余概已完成”；金华工事“刻已全部完成，正增筑外壕铁丝网等副防御中”；兰溪工事“已完成大部，刻正加紧构筑中”；衢州金华间工事已完成一部分，另一部“尚待临时实施”；金兰衢各点“已完成炮兵测地工作，炮兵观测

① 「米国の東京空襲問題 東京空襲八結局失敗」、昭和17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25060900。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12页。

③ 「19号原田混成旅团作战计划」、昭和17年4月1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3070495200。

④ 「第13军発来电綴（写）」、昭和17年4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2122329500。

⑤ 《会战前敌情梗概》，1942年5月，档案号787-1047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⑥ 「登参电第六百四十四号」、昭和17年4月2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2122397300。

⑦ 「大陸命第六百二十一号」、昭和17年4月3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60907400。

⑧ 「せ号（浙赣）第1期第2期作战经过概要」、昭和17年6月2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3071107900。

⑨ 《顾祝同电蒋中正二十日日机由杭州分批自诸暨侵袭义乌丽水并造成灾情》，1942年4月2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200-00074-243；《顾祝同电蒋中正二十一日日机分批侵袭衢州丽水机场》，1942年4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200-00074-245。

⑩ 顾祝同：《墨三九自述》，第214页。

⑪ 《蒋中正电顾祝同》，1942年4月2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6-00016-055。

所掩蔽部等完成一部,炮兵阵地待时构筑”。^① 顾祝同虽然按照蒋介石要求部署兵力和构筑工事,但对决战地点其却倾向“金兰”而非“衢州”。他说:“我并于四月上旬,特别召集军以上幕僚长会议,详商有关战备事项,会中决定如果日军进犯,应在金兰地区决战为宜,因而策定保卫金兰衢作战指导腹案。”^② 故此,在浙赣战役爆发前,顾祝同多次就“金兰决战”计划向蒋介石请示,直至蒋介石下令坚决执行“衢州决战”计划。

4月25日,顾祝同在回电蒋介石时再次提出“金兰决战”计划,他说:“窃查本战区今后作战指导,经加熟虑,欲确保衢州,须先保金兰,务求能在金兰地区击破敌人,较为有利。”^③ 对此,蒋介石未置可否。5月1日,蒋介石电顾祝同:“敌即将进犯第三战区,希切实准备。前令各处构筑工事程度及部队部署情形详报,并将各地不急要之兵力抽调集结,以备增援于金衢之重要路线为要。”^④ 在这份电报中,蒋介石预判日军即将对“金衢”发动进攻,其抗击重点仍为衢州,或者说金兰与衢州并重。但顾祝同回电却仍然强调“金兰决战”,其电称:“今后战区对进犯之敌,决以确保金兰要点为目的,先以有力部队逐次在金华附近及东阳、义乌、浦江、建德各既设阵地予以打击,尔后依固守金兰及切断敌后方诱致敌于金兰要点前,以主力由金华东北、西北地区合力围击而歼灭之。”^⑤ 5月16日,蒋介石电顾祝同,“王、丁两军现到何处? 将来如何使用? 又衢州工事及部队布防已否完成? 对于炮兵阵地之选择与炮兵之集中使用更应特别注意,迅速实施,务限于本月底完成一切为要。”顾祝同回电除汇报衢州战备工事、炮兵部署以及王铁汉、丁治磐两军位置外,再次请示“丁王两军可否使用之参加金兰会战,予敌以歼灭打击之处理”。顾祝同之所以将两军定为“金兰决战”主力,在于他综合5月以来“各方报告”,发现“集结萧绍富余及杭州之敌约共四万”,如果没有后续增援,日军以其现有兵力“似无力进犯衢州”。^⑥ 对此,蒋介石在回电中直截了当地提出:“王铁汉、王耀武、丁治磐三个军皆集结于衢县附近,切勿控置在金兰一带,被敌逐次消耗。我军方针决在衢州决战,不得变更。此作战方针,希即照此部署勿延。”^⑦ 此回电再次表明,在蒋介石的浙赣战役决策中,只有“衢州决战”计划而没有“金兰决战”方案。

美军轰炸东京后,日军采取报复行动,将“十九号作战”就地更改为“浙赣”作战。蒋介石在前期“衢州决战”战备基础上,命令第三战区在兵力部署、炮械装备、战斗工事、决战策略等方面从速完成,做好与日军“决战”准备。从这个角度看,蒋介石的“衢州决战”计划,并非专为盟国承受日军报复的“被动”应战。故此,“衢州决战”既是此前主动因应日军“西进”攻击的延续,更是对盟国“牺牲”限度的正面回应。一方面,为抗击日军“南进”攻击,蒋介石愿意继续为盟国承受来自日军的报复,希望以“牺牲”换取盟国,尤其是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为抗击日军“西进”攻击,蒋介石也希望能够在衢州与日军决战,为中国抗战牺牲。

三 “衢州弃守”决策中之“牺牲”限度

1942年5月16日上午八时,蒋介石召集徐永昌等人召开军事会议。据徐永昌日记:“会议讨

① 《顾祝同电蒋中正呈复衢州金华一带工事程度及兵力部署由》,1942年4月2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297-031。

② 顾祝同:《墨三九自述》,第214页。

③ 《顾祝同电蒋中正呈复衢州金华一带工事程度及兵力部署由》,1942年4月2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297-031。

④ 《蒋中正电顾祝同》,1942年5月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60100-00164-001。

⑤ 《顾祝同电复蒋中正关于作战准备及兵力调集情形》,1942年5月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60100-00164-001。

⑥ 《蒋中正电顾祝同询衢州工事及炮兵阵地选择与集中使用应特别注意》,1942年5月1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14-011。

⑦ 《蒋中正电顾祝同国军作战方针在衢州决战不得变更此部署》,1942年5月1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14-013。

论：（一）敌在杭绍宁一带已开始出动问题（数日前已有杭敌在杭州一带增两三万人，但敌之增兵在我增兵三战区之后，敌最近又增万余，早判断其将主动对衢州等有机场区域进攻，所以增兵，但十之一二或亦因我而来），决定以二十六军、七十四军（增到之兵）及四十九军、八十六军集衢州以打击之。”^①对于会议当日所讨论日军增兵事，蒋介石在日记“注意”栏中写道：“敌军明白宣布，向浙江各空军基地进攻，幸其兵力仍在中国各战场凑集，而未由东北抽来，当易应战也。”^②这则日记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蒋介石据日军消息确定其浙赣作战目标是浙江境内各空军基地，以“衢州决战”因应当属正确；其次，蒋介石庆幸日军投入浙赣作战兵力未从东北调来，进一步证实他在此时期有关日军“北进”，日苏战争必将爆发的研判；最后，基于数月之“衢州决战”战备，蒋介石认为此次浙赣战役“当易应战”。他在该周反省录中称：“滇西战局已稳，而浙东倭寇，向我衢州进攻，已如预期者开始。准备已久，不难制敌乎。”^③徐永昌日记亦能佐证：“敌对我及对澳苏之研究，余谓我固应努力，准备敌之大举进犯。唯敌在现战场兵力对我不能特别深入，即抽东北对苏兵内用，则无以对轴心国且因以受苏挟制；抽太平洋兵则有受美反攻，失其所得之虞。所以在目前敌正焦急而未有决策之时。”^④蒋介石认定只要中国愿意为美国“牺牲”，与日军“衢州决战”，就能维护其“抗战政局”，以“牺牲”赢得英美尤其是美国支持，既利于抗击日军“南进”，又能够抗击或延缓日军“西进”，还可以令日军不改“北进”计划。

在这样的认识推动下，蒋介石积极投入“衢州决战”。顾祝同称：“及至美机轰炸日本本土后，五月上旬，日军在钱江南岸及浙西一带，逐次集结兵力，日机并到处侦察，其攻势企图，已日见明显，我乃令各军依策定方案积极备战。”^⑤5月16日，蒋介石电顾祝同，称日军调集一两万军队从进贤向鹰潭推进，准备夹击衢州玉山，“应即严令沿路军民，限期彻底破坏道路桥梁，使敌无法挺进”，并下令“在途中多埋真假地雷、手榴弹，使敌不敢急进”。^⑥5月17日，蒋介石“连电顾墨三，改正作战计划电稿，约四五次之多”。^⑦如他电顾祝同，为执行“衢州决战”，我方“炮兵亦应尽量向衢移动”，他希望顾祝同将预备炮兵之外所有炮火“全部速调衢州布置”，并命令“玉山常山防务更应特别注重，尽力增强为要”。^⑧再如他第二电再次指示顾祝同，“衢州防务须限一星期内完成”，淳安经遂安、开化至常山，寿昌至龙游公路以及衢州周围各大小道路皆应全部破坏，“凡能集中之部队，务希尽量调集为要”。^⑨5月17日，蒋介石电顾祝同，批评其“衢州决战”部署尚有未妥之处，“即原定部署为处处设防，形成处处薄弱，未有重点之弊”，命令顾祝同除将一个师兵力驻守玉山与常山防线外，将所有兵力调往衢州决战。^⑩5月19日，“上午批阅，手拟浙战令稿数通，研究浙战颇切也”。^⑪同日徐永昌记“对于敌扰浙江意见”。^⑫此即蒋介石电令顾祝同注意防范日军进攻金衢步骤，并提出了具体的

①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5月16日，第401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16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

④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5月16日，第401—402页。

⑤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第214—215页。

⑥ 《蒋中正电顾祝同日军在南昌增兵南行将与钱塘江日军来击衢州玉山即严令彻底破坏道路桥梁》，1942年5月1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14-015。

⑦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17日。

⑧ 《蒋中正电顾祝同指示既已改在衢州进行决战速调炮兵及金华之战防炮增防衢州另应尽力增强玉山常山防务》，1942年5月1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6-00016-174。

⑨ 《蒋中正电顾祝同衢州防务限周内完成并查报公路破坏实情及询25军能否集中衢县附近》，1942年5月1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6-00016-159。

⑩ 《蒋中正电顾祝同抽调部队加强后方衢州防务及玉山常山间配置一师以上兵力固守》，1942年5月1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6-00016-172。另见《蒋中正电顾祝同全体部署尚有未妥之处兵力应集衢州》，1942年5月1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14-021。

⑪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19日。

⑫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5月19日，第403页。

应对策略。^①顾祝同回忆证实,“此次战役,规模之大,为战区近年来所仅有。故自统帅部至各级战斗单位,都极为重视”,蒋介石“也每天不断以电话或电报,作周详的指示”。^②5月16—19日间蒋介石不断致电顾祝同,可见其对“衢州决战”之信心与行动。

5月21日,蒋介石日记称“浙东敌寇进攻衢州”等“乃最近之显患”。^③徐永昌称:“杭州新到敌万余。据情报判断敌约集有十一个联队,我准备二十二个半师应战,其战斗力最低限抵敌十四个联队(判断敌十一个联队则为最大限),准备如此全看高级将领努力[力]如何。”^④前文已论,从“衢州决战”战备阶段,中国方面判断日军投入兵力从一两万增加到4万余人,尚属“能战易战”。孰料浙赣战役伊始,日军不断增兵,中国方面面临“能战但不易战”的困境。5月22日,蒋介石提出“衢州守弃之方针应早决定,如为国际轰炸倭国,而强勉固守,已不必矣”。^⑤为何数十小时之间蒋介石就认为为盟国继续“牺牲”毫无必要呢?在此前两天5月20日,蒋介石日记称:“近日国际环境,徒有势利而无信义,对于大战前途,渐觉烦闷,人类福音,亦感茫然无期。去年此时,英国正欲我强用罗杰士为平准委员,余严拒却之,而美国对我国之援助,亦只口惠,其实冷淡非常。今自缅甸失败以后,美国已允我四发动机飞机五十架、接济我物资之约,亦食言变更。可知国际只有自利,余今始觉悟矣。”^⑥由此可知,蒋介石对英美一再“牺牲”中国,且“自私自利”“食言变更”等行径,“烦闷”不堪,觉得前景“茫然无期”。因此蒋介石不愿意为盟国轰炸日本本土提供机场而“强勉固守”衢州。

5月23日,蒋介石日记“注意”栏写道:“衢州与丽水两机场以郑重考虑之后,决心破坏,不能再以美国预约施用该场关系,而致我本国本军之得失成败于不顾也。敌军目的,全在此机场,若我自动破坏彻底,或可懈敌攻衢之意。果尔,则吾计售矣。”此外,当天下午,蒋介石特意指示熊式辉在华盛顿太平洋军事会议上“声明意见之态度”,并以此“间接告知罗总统,以我国危状使其注重中国战场也”。^⑦这表明,从5月20日“觉悟”,到5月22日倾向于不再为盟国“牺牲”再到5月23日“郑重考虑之后”,蒋介石基本确定放弃“衢州决战”,自行破坏衢州、丽水两机场。从日记内容看,蒋介石作此决策,一方面系不愿因“美国”之需而置衢州成败于不顾;另一方面系因应日军“目的”,希望自行破坏以“懈敌攻衢之意”,为防御日军“西进”攻击保留“实力”;再一方面,蒋介石希望通过熊式辉之口告诉美方,浙赣战役本为美国“牺牲”,但因英美不重视中国战区,无视中国之“牺牲”,中国也就不愿意再为盟国进一步“牺牲”。

徐永昌根据情报获知,5月21—23日,3万多日军通过铁路从南京、上海增兵杭州,认为浙赣战役伊始,日军“尚大量增兵,其势似不占衢州不止”。^⑧徐永昌的观感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整体认知,认为日军发动浙赣作战目标就是攻占衢州,故不应与日军“衢州决战”,以免万一“衢州决战”失利,损失大量战力后,被日军趁机利用,顺势“西进”。在5月27日日记中,蒋介石再次表明:“敌军抽调在华各战区精强部队约五万人,集中于浙东,进攻我衢州等之空军根据地,其势在必得;而滇西怒江西岸、龙腾一带,残敌仅千余人,顽强负隅。余注全神于滇西千余之残敌,故不忍令美空军志愿队,调援浙东之大战,而留其在滇,协助我陆军肃清滇西之残敌。以今日情形,后方重于前方,尤其滇西,不能不从速肃清,至于金衢之得失,已不关今日战局之成败矣。”^⑨蒋介石对同时进行之滇缅战役与浙赣战役作了比较,认为浙赣战役系日军对衢州等地机场“势在必得”;而滇缅战役中

① 《蒋中正电顾祝同日军进攻金华衢州行动与步骤及国军预防措施》,1942年5月1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14-027。

② 顾祝同:《墨三九自述》,第215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21日。

④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5月21日,第406页。

⑤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22日。

⑥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20日。

⑦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23日。

⑧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5月26日,第408页。

⑨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27日。

日军在滇西怒江西岸及龙腾一带仅有“残敌”千余人。两相比较,固守“衢州机场”是为盟国牺牲,滇西收尾之战则为拱卫重庆,“后方重于前方”,前者失陷只关乎美军轰炸日本失去备降机场,而后者得失却关乎重庆安危,故前者可失而后者不可失。

与此同时,“衢州决战”胜负形势越来越不利于中国方面。丁治磐称:“由于国军在浙赣线防务非常空虚,三战区久未作战,向为川军及地方部队驻守。在我军尚未抵达战场时,日军已于五月二十七日攻占金华,将机场破坏,美军飞机已无法再运用此基地。衢州机场吃紧,我军在衢州、金华一带山区艰苦作战。”^①顾祝同称:“经过与日军几天的激战,至五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我军以在金、兰地区消耗日军的目的已达。日军酒井师团长且被我击毙,乃将金、兰两城,相继放弃,转入北山敌后袭扰。”^②蒋介石则称:“金兰各城虽陷,然并未决战。敌如直攻衢州,则彼知我准备充足,非其现力所能必胜,或有中止可能。即使其来攻,予以打击以后,暂时放弃,使其如期达成占领衢州之目的后,可早日北进也。以衢州之得失,今日于我之作战,实已无关重要,而倭则非占领不可之势也。”^③第三战区发回战报表明,“衢州决战”中每一役,中国军队均伤亡惨重。“敌机二十七架向我猛炸,阵地大半被毁,该部仍坚强抵抗终以伤亡惨重乃向北山方向突围,肉搏数小时,二十九日未始抵大盘山。是役我伤亡营长以下官百员,士兵一千余,敌几倍之。”^④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放弃“衢州决战”决策越来越确定。5月30日上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作战会议。据徐永昌日记,会议第三项议题是“第三战区作战诸问题检讨”。^⑤蒋介石的态度,应如其5月31日日记所称,“浙东、赣西皆无甚关系,不必力争”。^⑥按照5月底战况,中国方面认为“衢州决战”已取得一定成效,已达到“消耗日军目的”,故可在“予以打击以后”对衢州“暂时放弃”,如此,可诱使日军“早日北上”而无暇无力“西进”。可见,蒋介石已经比较明确地准备放弃“衢州决战”。

进入6月,日军持续投入大量兵力。据徐永昌记录,“判断战区当面发现敌番号及兵力计有十二师主力、第三师主力、百十师之一联队、十七师之一联队、七十师(似二十独旅改编)及二十二师全部、十一独旅一部、第一独旅主力”。^⑦日军摆出“衢州决战”态势,成为压倒蒋介石是否放弃“衢州决战”决策的最后一根稻草。6月2日,蒋介石日记提到:“敌军调其在鲁之卅二师、在冀之一一〇师到浙东参战。而且南昌与广州之敌,皆自一日起发动攻势,牵制浙东战争。我为政略计,固应放弃衢州,而今为兵力计,亦应放弃衢州,万不可以无关紧要一地之得失,争一日之荣辱,而置忘最后成败之大计也。”^⑧蒋介石从“政略”和“兵力”两个角度,再次计划放弃衢州。

6月3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放弃“衢州决战”。徐永昌日记详细记录了军事会议讨论放弃衢州决战决策及原因——保存军力,防御日军沿浙赣铁路“西进”:

八时在曾家岩会议,决定放弃衢州决战,将我有力部队向各方面分散并准备打击其向浙赣路再深入。其重要理由:(一)判断敌攻衢可用约三师团(其后方约两师团),出我意料之外;(二)节用械弹(以后补充太难)。又衢州本无大价值(机场原受杭机场拱制),敌由各方抽兵来(山东之三十二师、河北之百十师、山西第一独旅、苏北之十七师、湖北之第三师第四十师各一部或主力),如不能达预期目的,即是敌之损失(浙地缺粮,彼兵不能分散,且分裂之部不能久留),且我在现地域损失过大将无以制其深入浙赣路。^⑨

而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他因为“衢州决战”与否之方针未能决策,“忧虑异甚”。他说“过去经历”

① 刘凤翰、张力访问《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75页。

②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第215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29日。

④ 《第三战区顾祝同等关于浙赣会战等文电》,1942年6月,档案号787-104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5月30日,第413页。

⑥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31日。

⑦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6月2日,第416页。

⑧ 《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2日。

⑨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6月3日,第417页。

不断证明“往往为一时之毁誉得失，而贻误战略，且致政略失败”，其中北平、南京以及此次缅甸进退守弃之教训，“尤为寒心”。当他看到日军“抽集在华各战区最大限度之兵力，与其空军之掩护”，对衢州等机场所在地“志在必得”，而中国若坚持与日军衢州决战，“不仅无甚意义，而且徒耗兵力，不易补充也”。鉴于此，蒋介石决定放弃衢州决战，“使之扑空，不能达成其击破我主力军之目的，而且保全我实力，犹可屏障赣、湘也”。此外，蒋介石特别提出，“总不可使敌军在东北部队，调移于关内，此为唯一之要略也”。^①应该说，蒋介石最终决定放弃“衢州决战”，与他的“抗战政略”息息相关。首先，蒋介石绝不愿意纯为盟国抗击日军“南进”而“牺牲”兵力；其次，为中国依靠自身兵力抗击日军“西进”保留战力；最后，防止日军放弃“北进”计划，降低日军“南进”“西进”给中国造成的压力。

概括而言，浙赣战役爆发后，蒋介石坚决执行“衢州决战”计划，既是他始于1月中旬防止日军“西进”进攻之“衢州决战”战备的延续，也是他愿意为美军轰炸日本本土而“牺牲”之结果。但随着浙赣战役中日军从华北和华南调集更多军队投入浙赣作战，企图与中国“衢州决战”，以及缅甸战场上英美再次无视中国为防止日军“南进”所作“牺牲”，并为了防止日军将东北日军调来华中作战而放弃“北进”计划，蒋介石决定放弃“衢州决战”，将衢州机场等自行破坏后撤出浙赣战场。蒋介石在数天内从“坚持”决战到“放弃”决战之急转，与蒋介石“抗战政略”中之“牺牲观”有莫大关系。蒋介石愿意为盟国“牺牲”，但不愿意“牺牲到底”，毕竟“保存实力”才是根本。也就是说，在彰显“实力”与“大局”吻合时，可以作出“牺牲”；当“保存实力”与“大局”吻合时，只可适当“牺牲”。这便是蒋介石“衢州决战”决策“牺牲”之限度。

结语：以义应之与以力应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寄寓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边陲，不断遭遇日军“西进”威胁，而接受英美援助又仅剩缅甸这个唯一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紧“南进”，进逼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度等英美殖民地。英美加入对日作战，苦撑待变的蒋介石顿时觉得其“抗战政略”几达“顶点”。为着这一“抗战政略”，蒋介石致电英美两国，希望结成军事同盟，率先击溃日军，赢得东方战场的胜利。蒋介石甚至愿意为此作全部之“牺牲”。

然而，英美采取欧洲优先战略，即便蒋介石愿意为其作全部“牺牲”，也无法改变其“欧洲优先”策略。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三天，蒋介石就已认识到英美对中国不尊重：“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对我各种轻蔑之行为。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之以消耗日本实力之经过事实，更无足为歉也。国际间本是利害为主，决无为人牺牲之国，若以此为怪或为愧，则痴矣。”^②蒋介石虽然明了国际关系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而“决无为人牺牲之国”，但国际关系中的弱国，若想赢得强国认可与支持，似乎唯有“牺牲”一途。

那么，对长期蔑视东方战场之英美强国而言，弱小国家之“牺牲”在何种程度上有价值呢？蒋介石说1942年初日军“南进”，在菲律宾、马来半岛以及婆罗洲等西太平洋各岛“可谓战无不利，攻无不克”，“独在长沙之役，五年以来倭寇则受最大之惨败”。两相比较，英美政府及其舆论“于此方知倭寇之强优，及反影〔映〕我国之不弱，公认我五年抗战之艰难”。针对英美对华传统之观念“仍不胜其轻蔑心理之表现”，蒋介石提出“彼恃其力，我优其礼；彼以其利，我以其义以应之，终能使彼等知我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文化，为不可侮之觉悟耳”。^③为了让英美知晓中国“不可侮”，蒋介石主张以礼服人、以义应之。而所谓“以义应之”，包括为抗战道义、同盟道义而“牺牲”。故当缅甸局势危急，英方请求中国援助时，蒋介石毫不犹豫地答应派遣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① 《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3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11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反省录。

此外必须强调,蒋介石对弱国以“牺牲”换取强国支持,是有限度的。在1942年2月反省录中,蒋介石说:2月23日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决定“取消西南太平洋战区,放弃荷印”,当时“荷兰代表在会,要求不放弃荷印,而英国置之不理,唯以劝慰荷兰政府仍努力奋斗,共同作战一语了之”,蒋介石评论称“弱小国家之供人驱使与牺牲,结果如此,能不为之寒心与戒惧乎?”^①显然,在蒋介石看来,弱国为强国“牺牲”是舍生取义,强国不应当置弱国利益于完全不顾而令弱国寒心,且因此“戒惧”。也因此,当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后,因英美原因而“牺牲”巨大时,蒋介石既“寒心”又“戒惧”。在3月14日上星期反省录中,蒋介石进一步指出:“此后若徒望英美之力来援取胜,则不可能。唯求如何自立自保,为唯一之道。今后之计,当先求自保自立,而后待机取胜。”^②蒋介石对“牺牲的限度”,有着清晰的理解。

由此认识出发,当日军因美军轰炸东京而报复中国时,蒋介石开始愿意为盟国“牺牲”,以换取美国援助,尤其是战斗机军事援助。但当这些援助一次又一次被英方挪用而不得时,蒋介石“对英国嫌恶太甚,时发怨言,因之对其外交,亦渐露矜矜之气。唯英态鄙贱自私,而不肯为公义,稍致损失,故非严正对之不可也。然而对美国,亦甚以不逊之态对之”。^③1942年5月12日,蒋介石对丘吉尔5月10日演说“对战局独重俄国,兼带美国,而对于我国只字未提”一事,十分气愤,谴责说:“缅甸初败,我军被欺受诈为其牺牲,而且仍在缅境被围,未脱险境,彼不仅不加救援,而亦未提我援缅之贡献,于情于理皆无,此种恶劣之态度,可憎已极。”^④在浙赣战役过程中,衢州大雨,中国守军突围困难,与外界失去联系,而“美国志愿队亦不肯赴援”,蒋介石气称“以如此国际同盟战争,而使守备部队既不能通电,又不得用飞机通信,此种苦痛与屈辱,非局外人所能料及也”。^⑤在蒋介石看来,无论是缅甸战场中国远征军为英国“牺牲”还是浙赣战场为美军承受日军报复而“牺牲”,都因英美无德失信、自私自利,皆无信义,使其不愿再继续“牺牲”。于是,蒋介石放弃了“衢州决战”。

进入1942年7月中下旬后,浙赣战役进入尾声。7月18日,蒋介石根据“近来形势观察,同盟国自招失败,贻误战局之点甚多。英美对亚洲有色人种观念,根本不易改变,非我国独立奋斗,至百年之后,决难平等”。^⑥7月27日蒋介石更是痛批“帝国主义者,无论其为何国,其对被压迫之国家,皆无诚意可言,非利用即高压,皆抱可欺则欺,可侵则侵之心,吾人若一以克己复礼,谦恭自持之道待之,则适中其计谋矣”。^⑦蒋介石“以义应之”,以“牺牲”换取强国支持的行为和愿望,只是一厢情愿,白白“牺牲”。

毕竟,国际关系运行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强国不会单因“道义”而为弱国“牺牲”;强国也不会单因弱国为之“牺牲”而有“道义”。在“国家利益”面前,“以义应之”无疑是苍白的。因此,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像中国这样的名义上的“四强”国家实际上仍然是被压迫的“弱国”,唯有“以力应之”,壮大国力、壮大军力、壮大民力,才能在国际舞台中求得国家之独立、民族之平等。

(责任编辑:潘致远)

① 《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28日上星期反省录。

② 《蒋介石日记》,1942年3月14日上星期反省录。

③ 《蒋介石日记》,1942年4月18日,上星期反省录。

④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12日。

⑤ 《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6日上星期反省录。

⑥ 《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18日。

⑦ 《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27日。